

从《老子》到《史记》的 一统思想论稿

丁德科 著



1912-19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丁德科 著

从《老子》到《史记》的一统思想论稿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老子》到《史记》的一统思想论稿/丁德科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403-5

I. ①从… II. ①丁…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
研究③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④《史记》-研究
IV. ①B223.15②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82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从《老子》到《史记》的一统思想论稿

丁德科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403-5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640×980 1/16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3/4

定价: 58.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古代“一统”思想，主要是儒道及其他思想学派和思想家关于统一的哲学基础、前提条件、方式途径等的整体思想。这一思想，涉及对构成人类社会之起源和法则的分析，社会主体的人的思维和素质的估价，民族生存及关系的根本意义的追寻，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普遍原理的探讨，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和看法，是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体系。从先秦到西汉初期以及以后的儒、道思想家，关于一统思想各有论说，且兼综融合，纷呈多彩，主要是春秋末期《老子》因任“自然”的“道治”社会政治方案，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战国时期稷下道家及《管子》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理论，《易传》一统于“仁”的世界观，孟子“仁政”为核心的“王天下”理论，《庄子》“道”一统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荀子“义”一统的“一天下”构想，《吕氏春秋》建立和治理统一的封建国家方略；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的道法家治国理论，《淮南子》关于封建统一帝国长治久安的理论，《公羊传》建立汉王朝“大一统”格局的基本思路，董仲舒笼罩在神学烟霭中的“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司马迁唯物的“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本书勾勒先秦一统思想的脉络，从《老子》到《史记》，总结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了最简洁的概述。全书五章，附录相关论文八篇，总题《从〈老子〉到〈史记〉的一统思想论稿》付梓，以期抛砖引玉。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 1
- 一、先秦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1
- 二、先秦儒道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 2
- 三、先秦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思想文化渊源 4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一统思想

-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 12
- 一、老子因任“自然”的“道治”社会政治方案 13
- 二、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31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一统思想

-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发展 49
- 一、稷下道家及《管子》关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理论 50
- 二、《易传》一统于“仁”的世界观 76
- 三、孟子“仁政”为核心的“王天下”理论 89
- 四、《庄子》“道”一统的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 103
- 五、荀子“义”一统的“一天下”方略 116
- 六、《吕氏春秋》建立和治理统一封建国家方略 133

第四章 西汉时期的一统思想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成熟和完备	148
一、汉初黄老道家的道法家的治国理论	149
二、《淮南子》关于封建统一国家长治久安的 理论学说	162
三、《公羊传》建立汉王朝“大一统”格局的 基本思路	177
四、董仲舒笼罩在神学烟霭中的“礼义”一统的 国家学说	190
五、司马迁唯物的“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	205

第五章 历史与现实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现代价值	228
一、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核心内容	229
二、先秦儒道一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主要内涵	233
三、先秦儒道一统思想形成的内质和精神	240
四、先秦儒道及古代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	243
五、先秦儒道及古代一统思想的现代价值	250

附录 相关论文选录

从西周大一统思想看秦学的原创性特征	257
一、天下一统思想	258
二、相融和谐思想	259
三、宗法礼制思想	260
四、敬天保民思想	262
五、反对分裂割据思想	263
结语	265

《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及其启示	268
一、“王道”经济观是《管子》运用经济策略	
实现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268
二、《管子》“王道”经济观指导下的轻重策略	272
三、《管子》“王道”经济观及其轻重策略的启示	274
四、《管子》的“王道”经济观与当今国家安全	
经济思想	276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279
一、“王道”经济观是《管子》运用经济策略	
实现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279
二、《管子》“王道”经济观的基本内容	281
三、遵从“行义”、“顺于理义”是《管子》	
“王道”经济观的最高政治原则	289
秦文化现代价值：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资本	292
一、秦地陕西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的历史审视	292
二、树立以先进文化促进陕西经济跨越式发展	
的战略思想	296
三、实现以先进文化促进陕西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突破	298
唐以前秦地经济：中国原始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雏形	
——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305
一、秦地的历史地理	306
二、秦地原始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307
三、对秦地原始市场经济史的基本认识	312
论经济文化互动发展	316

文化底蕴：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本	329
一、文化、哲学和文化底蕴	329
二、哲学的精湛思想和基本精神是文化底蕴的 主要内涵	331
三、文化底蕴是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本	335
中国思想文化创新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341
引用和参考简目	349

第一章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 产生的历史渊源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而自觉的民族实体，“自在”是外在的，表现为多元一体的格局；“自觉”是内在的，表现为文明一统的走势，也就是以进步文明为核心的向心性、凝聚力和发展观。“自在”与“自觉”诸因素的产生发展以至结合统一，是中华民族文明构建、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儒道一统思想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古代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一、先秦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生存发展的空间的生态功能，是先秦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地理条件。“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广

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① 这个自成整体的空间，分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边缘过渡带等三大自然地理区。由西向东倾斜，西高东低。东部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中西部是海拔一两千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青藏高原海拔高达4000米以上，最高峰的珠穆朗玛峰为8848米。南北跨30个纬度。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纬度、不同的温度和湿度，以及山峦起伏、河谷纵横的不同地形，构成了最为丰富多样的景观类型，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多种可资选择的栖息地。“这个复杂的空间有着复杂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② 这当然是先秦儒道一统思想孕育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二、先秦儒道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

民族交流与融合以代表进步与发展的群体为核心的多元一体趋势，是先秦儒道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逐渐形成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遗存的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根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揭示，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有着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并按自然地理区域形成了以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黄河流域、太湖地区等为中心的格局。据此，考古学界提出了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同上。

晚段，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前，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说明，成熟的文明因素在广泛区域内积淀，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正在中华各地加速形成，中国历史走到了构建文明的最后阶段。中国历史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夏文化，最初形成于“龙山时代”。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即夏王朝诞生时期。龙山文化城址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六大古文化区系^①中，分别相对于我国传说时代至历史早期的华夏、东夷、巴蜀、荆楚、吴越等民族集团及其先民的活动区，而不同区系中相继出现的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等级群落”结构，就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实体的考古遗迹。在这种新型的政治实体中，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集中，私有制已经成熟发展；社会内部严重分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分等级的中小城市与村落围绕着一个大型中心城市，已形成“都”、“邑”、“村”三级聚落层次；那些占据群落中心、位居高台建筑内发号施令、处于权力最上层的实体首领，随着国家（或称酋邦制）的形成，开始逐步蜕变为方国的“国王”。同时，铜器、文字、礼制等中国文明的表征产品在龙山时代也同步复杂化，与国家文明加速成长的形势相合。铜器技术和形态明显进步和复杂化，其使用已经超越了仰韶时代零星、个别的特点；文字在从刻划符号式的原始文字走向成熟和象形文字发展的轨道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礼制的复杂化也达到了先夏的顶峰阶段，是宗教祭祀和礼制文化愈趋成熟的阶段。中心城市和大小城市是不同层次的宗教礼仪中心，城内外的祭坛祠庙和广泛出土的卜骨，表明早期的政教合一在推进早期文明的进化中有多重要。这些，都成为国家文明大厦即将落成的重要表征。与历史上的五帝时期，尤其是尧舜时期的历史传说相对照，可以说是丝丝入扣。如果把史前城址的分区与传为夏书^②的《尚书·禹贡》的

① 龙山文化城址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六大古文化区系分别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太湖地区。

② 实为战国采择上古传说的作品。

雍、豫、青、冀、梁、荆、扬各州对照，也能大体契合。^①

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分别是黄帝、东夷人和西戎人的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的夏部族于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商部族是迁徙到河南东部的，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在灭商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由于其地理生态条件的优越，成为文明初期生存的最佳地理位置，因此也是先进部族的必争之地，从而成为夏商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先进的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而形成的，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此后，汉族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文化的先进而极大地影响了周边民族，周边民族也从人口数量和素质、经济生活和生产、文化等多方面向汉族注入精华的因素，影响了汉族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和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三、先秦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思想文化渊源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萌芽、构建和初期发展标志的“礼”，是

^① 参见吴春明：《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林向：《近年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99 年 7 月 9 日第 7 版。

儒道一统思想产生的思想文化渊源。这是因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世代相沿的主要形态，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语。“礼从人类天然具有的敬祖亲子的感情出发，发展成维护尊卑之别的等级制度，又回到人类自身的人格修养，达到‘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的境界，使得物质分配制度得到情感上的依归，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兼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重意义。”^①一句话，礼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志。

礼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史前人类由于对大自然的期盼、有求和不能认识的迷惘、畏惧而祭鬼神，由此自由崇拜，逐渐发展为人类自身崇拜。这是由于史前人类对与自然抗争的祖先的追悼和敬仰，以及希望祖先神灵保佑的祈请。这对维系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宗教意义，也使重视生命和现实的原初心理得以向入世、积极的现实主义发展。祭祀之礼的发展，可贵的是进入人类饮食、男女，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力量和生动表征。大概在殷商，统治者把以往政治实体神化自己权威的做法发展到极致，创造了最高权威的天和上帝，并自称为受命于天的天子、上帝安排在人间的下帝。这就置自己于沟通天和上帝与人间联系的地位。而祭祀的重点，也当然而然地成为天子、下帝的祖先，进而按照血缘亲疏远近到宗庙、祖庙、弥庙祭祖，用以界定尊卑贵贱上下主从的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全民性的礼仪被君主贵族所垄断^②，礼注进了以尊君为核心的政治内容，神权与政权合一。但同时，由祭祖而敬老，由敬老而序长幼尊卑的礼仪，又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超阶级的存在，保留了礼的一定人民性。^③

① 刘志琴：《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② 君主贵族对礼的垄断，也表现在自设“礼不下庶人”的界限。“礼”的超阶级的人民性，以及孔子儒家纳仁入礼的理论论证，使得“礼不下庶人”的界限无存。

③ 参见刘志琴：《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如上节所述，礼进入政治领域的脚步是与古代文明的进程相伴的。据学者考证^①，“礼”字很少见于金文中。在战国以前的彝器铭文中，唯见何尊一次。《尚书》中《洛诰》和《君奭》表明，周初“礼”仍寓于祭祀之中，但“等差”、“次序”以至制度的含义亦渐显露，“殷礼配天”^②也已经是殷的体制或王权的一种代用语了。“礼”字见于《诗经》者，皆指礼仪，有的具有制度的含义。春秋初期，人们对“礼”的概念逐渐明确。晋大夫师服说：“礼以体政，政以正民”^③。他已认识到“礼”是政治体制的核心。《礼记》云：“礼也者，体也。”^④“礼，体也。”^⑤。《礼记·释名》以“体”训“礼”，由此而出。春秋中期，鲁曹刿曰：“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⑥这又说明，“礼”是一种使社会成员有区分和等差的准则。而后，与孔子同时而年长的晋大夫叔向认为“礼”为“王之大经”^⑦，子产认为“礼”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⑧。可见，“礼”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进步和文明的象征。

有关周公制礼的事迹，有文载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⑨这是关于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礼记·明堂位》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西周礼制^⑩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

① 参见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

② 《尚书·君奭》。

③ 《左传·桓公二年》。

④ 《礼记·礼器》。

⑤ 见《礼记·释名》中《释语言》和《释典艺》。

⑥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⑦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⑧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大夫游吉引用子产语。

⑨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⑩ 西周的礼制反映在后人整理的《周礼》及《仪礼》中，但又不限于《周礼》及《仪礼》。《仪礼》较多为宗国礼制条文，而《周礼》一书是根据先秦礼制加以完善的，或者说根据一统国家的理想而有所发挥创造，是理想化了的著作。

域，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面而系统。关于经济方面，《周礼》主要记载了井田制说。这是春秋以前相对发达地区的实录。其中关于井田制有四处记载，就性质论，可分为两类：《大司徒》、《遂人》一类，记载授田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一类，记载每家可供力役的人数。其叙述近于实录，比较具体。在政治制度方面，《周礼》在九服之内分布着许多大小诸侯，然而这些诸侯在国王统辖下，他们不是独立的国家，一切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操在国王之手。《周礼》提倡一统，认为“一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中央君主掌握赏罚大权，此有“二柄”或“六柄”、“八柄”之说。《周礼·秋官·司寇》中表现为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体制。显然《周礼》主张以刑法巩固一统国家的社会秩序。宗周相传的社会文化，即生活中的礼乐文明，在《仪礼》中则保留许多。《周礼》、《仪礼》的内容自西周至春秋时代曾经实行过的条文，与先秦典籍中涉及各种门类的礼典和《礼仪》的记述绝大部分是一致的。周礼，全面切实地表现了宗周以来的礼乐文明。

西周是封建国家建立和完善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取得历史性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儒道社会政治一统思想的观念因素，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先秦儒道一统思想的观念因素^①，首先，表现为“礼”为核心的“天一统”、“王一统”。武王伐纣灭商后，周公继承并发展了殷人的天命思想^②，宣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认为周的天下是上天

① 参见任继愈、张岱年、冯契、汤一介等编：《中国哲学史通览》，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54—58页。

② 殷商有上帝神权观念，周灭殷后发展为天命主一切的观念。殷墟甲骨文中有“天邑商”的字样，这里的“天”作“大”解，亦即周人所称“人邑周”，只有自以为唯一而大目的意思，没有宇宙观的含义。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殷的统治者自认为足天下至终，其统治受命于天，从而形成了既代表“天”，又代表其祖先的观念“帝”，即“卜帝”，由此出现了唯心主义的宇宙观。这是以有意志的天为王权统治的合理做辩护，从意识形态领域里加强奴隶主统治的重要举措。

授予的，文王受大命于天。于是，“王”就是“天”。周人认为他们是天下最先进的部族，并以当时先进的“夏”自称^①。“夏”代表了当时的进步与发展，也即礼^②。因而说，受大命于“天”的“王”也代表礼。于是，天、王、礼一体，社会政治一统于代表礼的受大命于天的王。“礼”是一统的内在、一统的核心，“王”是一统的外在表现。随着周统治的稳固和疆域的扩大，周逐渐统一了“四国多方”^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人们思想中已有“天”或“王”一统的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天”或“王”一统，实质上是代表进步文明的部族的一统，说到底是以“礼”为集中表现的文明的一统。杨向奎先生说：“一统必有归宿，一统一于夏，或统一于夷？要统一于夏，诸夏即中国，中国即华夏，在一统思想体系中，突破夷夏界限，夷可以变夏，夏可以变夷。统一于夏，即一统于夏的礼乐文明，这种文明即以周礼为指归。”^⑤

其次，表现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式方法。这主要反映在《周易》、《尚书·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上。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人们通过仰观俯察，接触到天地、阴晴、日月、寒暑、水火、男女等自然的矛盾对立现象。随着社会分工、上下等级的出现，更面临着君臣、主奴、贵贱、贫富、治乱、兴衰等等社会矛盾现象。殷、周时期，人们在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向阳者丰收、背阴者减产，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从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中，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安危。殷、周之际的《易经》以广泛的矛盾现象和实际经

① 《尚书·召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② 事实上，夏已有比较系统的礼。《论语·为政》有“殷因于夏礼”的话。

③ 《周书·多方》。

④ 《诗经·小雅·北山》。

⑤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验为认识源泉，以吉凶祸福的矛盾转化为研究对象，从事物的普遍矛盾中概括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为阴阳范畴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先行资料。春秋末期思想家史墨从具体事物中看到了“物生有两”的矛盾。这都反映出，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事物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两方面相互对立和依存。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在积极地探索解决矛盾对立、达到统一和谐的方式方法，而且已深入到哲学思维的高度。这在《尚书·洪范》中反映得更为集中和突出。该篇有五行说，五行即水、木、金、火、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洪范”是大法的意思。该篇以建立统治秩序为中心，提出治理国家的九条根本大法，称作“洪范九畴”。其中以五行居首，用天象、人事、刑政、吉凶、祸福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比附于“五行”，以论证威福兼施、刚柔并用的为政之道，维护中央最高统治权力。史墨以“物生有两”的观点，分析了鲁君与季氏君臣关系发生变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洪范》和史墨所要维护的秩序，是包括自然、人和社会等整个宇宙的秩序，最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秩序。这为先秦及以后的思想家经世致用提供了良好的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路。

再次，表现为“敬德”、“保民”的政治观点。西周的思想家周公，在提出其不同于殷人天命思想的内涵——上帝可能改换人间代理人的观点时，认为地上的君王只有实行德政，顺从民意，上天才会让他继续统治下去，所谓“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了“德”和“民”的作用。他告诫统治者要注意“敬德”，“保民”，“知小人之依”，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周公天命观把“敬天”与“保民”直接联系起来，在宇宙观的发展上是一种进步。春秋时齐国的思想家晏婴，主张修文德，轻鬼神。要求齐君善理政事，多关心人民疾苦。春秋时期另一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的子产，提出人性观念，认为“小人之性，衅于勇，鬻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这些说明，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